

孫子的價值、思想與西洋兵法

第一 孫子價值

中國之有兵法，始於黃帝，史載黃帝經七十戰而定天下，歷代史書的藝文志裏，關於黃帝兵法的記載，種類很多，可是我們沒有方法看到這些書。相傳黃帝之臣，風后氏有兵法握奇十三篇，為宋以後一般研究兵學的人所祖述，但我們詳察它的文字，或許是依照唐朝的獨孤及（唐洛陽人，字至之，天寶末舉高第，補華陰尉，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要政，改太常博士，歷任濠舒二州刺史，以治課加司封郎中，徙常州，卒諡憲，及喜覽拔後進，性孝友，為文彰明載善惡，長於議論，有毗陵集。）的八陣圖而成的一部偽書。所以漢志、隋志、唐志都不書，而惟宋志載有之，帝王世紀說：「黃帝得風后氏於海隅，遂登以為相。」那末風后是否諳兵法，尚是一個疑問。又有封胡氏五篇，漢書藝文志已決定它為偽書。又有力牧兵法十五篇，史記說：「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班固說：「力牧，黃帝臣也。」帝王世家說：「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寤而嘆曰：『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於是依占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又有鬼臾區三篇，鬼臾區是黃帝臣，是占星之官。在上面這些記載中，只有力牧之書，或許比較可靠。黃帝之後，又有太公兵法，但這些兵法的內容如何，現在沒有方法去考證發現，其中或有流傳，則偽書的成份多，真書的成分少，當然不能代表當時軍學思想。我認為古代兵法中，最可靠最完備的，還只有孫子十三篇一種；這部兵法，不但是孫子在兵學上造詣的結晶，也是集中國古代兵法精華的大成，所以我們讀了孫子兵法，就等於讀了中國古代的全部兵法一樣。

國故學者，對於孫子十三篇的懷疑，在我們研究兵學方面，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我們研究十三篇，並不是以孫子本人為中心，而是以十三篇內容為精神，只要內容方面，在兵學上有千古不滅的指導精神，就是值得我們來研究的一部兵法，否則，即使是一部真書，但在兵學上沒有什麼貢獻，也僅是一部真書而已。因此國故學者說孫子並無其人，我們可以不加可否，又說孫子之書，是戰國相傾之說，我們也不覺得沒有理由。但如有人說：孫子之書在兵學上沒有一點價值的話，我們則要拿孫子的每一句話，來和他們爭辯。要是孫子之書，確是戰國相傾之說，而托名於孫武，那末我們只能認為孫子走運，竟做了中國千古之兵聖，絕不因此而減少十三篇的價值。

孫子之書，據史家的記載，認為除了十三篇以外，還有各種遺文流傳；周禮注記說：孫子有八陳，有革軍之陳。隋書經籍志說：孫子有雜占六甲兵法及八陣圖一卷，孫子算經三卷；唐書藝文志說：孫子有兵法提要。這些書我們現在搜集不到，不能判斷其價值；因此：也無從和十三篇參照來研究。我以為現在我們研究孫子兵法，只能以十三篇為基幹了。

孫子以後，兵家迭出，但是那些兵書，都不能超乎孫子以上。宋朝元豐年間，把太公六韜、尉繚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及孫子十三篇等七種兵書，定名為武經七書。大概以年代定次序，以六韜為第一書，孫子為第二書，吳子為第三書，司馬法為第四書，黃石公三略為第五書，尉繚子為第六書，李衛公問對為第七書。後來國子司業朱服（宋烏程人，字中行，熙寧進士，元豐中為御史，章惇欲見而用之，不可，尋劾之。紹聖初，累官禮部侍郎，知廬州，坐與蘇軾游，貶興國軍。）則以價值定次序，又把七書次序改為孫子第一。明朝洪武三十年，太祖令國子監將武經七書刊呈，並詔勒將門子弟誦習，以為研究武學的典籍，洪武三十一年，劉寅（明崑山縣人，洪武進士，所著三略直解，頗能發揮黃老沉機觀變之旨，參考諸本，註其異同，較他家特為詳盡。）又把七書註解，稱為武經七書直解。朱服列孫子為第一書，劉寅的直解，也以孫子為第一，我覺得這種排列的方法，很有見地。因為孫子的書，較其他六書，都來得博大精深，包羅宏富，語雖簡約，意義既非常深長，完全是原則的說明，而且這種原則，到二十世紀的現代，還是萬古如新。我們如果從戰爭思想方面來研究，孫子兵法的原則，不但適用於現代的作戰，而且成為將來戰爭新趨勢的指導精神。梅國禎（明麻城人，字克生，少雄傑自喜，善騎射，舉萬曆進士，除固安知縣，擢御史，忤拜反，詔遣李如松為提督往討之，命國禎監其軍，如松用國禎謀，大破賊，忤拜自焚死。論功擢太僕少卿，累選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卒。）說：「古今兵法，毋慮數十百家，世所尊為經者七，而首孫子。」又說：「古今兵法，盡於七經，而七經盡於孫子。」茅元儀（明歸安人，字止生，號石民，崇禎中佐孫承宗軍務，歷官副總兵，守覺華島，旋以兵譁，遣戍漳浦，邊事無，請募死士勤王，為庸奸所忌，悲憤縱酒而卒，有嘉靖大政類編，平巢事蹟考，藝話甲篇，西峰談話，青油漫史，福堂詩貝餘，石民四十集。）說：「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可見孫子十三篇的價值，古今均有同感。

第二 孫子思想基礎

孫子思想的基礎，在十三篇裏沒有明顯的說明，因為十三篇，是一部關於如何應用原則的書，所以解釋得非常簡略，孫子為什麼不詳加解釋呢？我以為是由於為進呈吳王的關係，他為取得吳王的信用，非把用兵的要訣，作一個詳盡的介紹，才能激動吳王的感情，而對他重用，如果作長篇大論的講解，對於急於興兵復仇的吳王（不是一位兵學研究者），倒沒有多大的作用。

孫子的基本思想是怎樣呢？有否受著過去的哲學影響？歷來研究孫子兵書的人，對於這一點，都沒有深刻的發揮，照我個人的意見，以為孫子思想的構成的基礎，乃受著黃帝、老子和周易的影響非常之大。

黃帝兵法的精髓如何，我們因沒有正確的材料，無從加以判斷，或許十三篇中有一大部份，就是轉述黃帝思想的。但這種推想，對於我們研究孫子的思想，並沒有多大幫助。我認為黃帝之所以能代神農氏而帝天下，完全是從戰爭中得來的。換

句話說，戰爭是立國的基礎，不能戰爭，就沒有國家，國家是為戰爭而存在，戰爭是國家的工具。我們翻開古今中外的歷史，來看一個民族的形成，全是由於不斷的戰爭，一個朝代的興替，也由於戰爭的勝敗，不但中國社會的歷史演變是如此，西洋也是如此，於此可見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動力，而是任何一個時代不能避免的。據西洋專家的估計，自有歷史以來，三千四百餘年中（以西洋為根據）僅有三百三十餘年沒有戰爭，其餘的時日，全在戰爭狀態中，所以二十世紀的社會，可說是過去不斷戰爭的結晶，將來的時代，也正由二十世紀的戰爭，在那裏孕育著。

黃帝以實戰的經驗，奠定了他對於戰爭本質的觀念——就是戰爭為立國的根柢，這種觀念，雖聖人如湯武，也不能不以戰爭來收拾天下的殘局，取人之國而代之。孫子在當時，受著這種觀念的影響非常之深，所以他在十三篇裏，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一名言，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謹說明社會中有戰爭那回事存在著，而沒有說明戰爭的本質。我以為是錯誤的，理由很簡單：

一、孫子既認為兵是小事，可見他已肯定戰爭是不可避免，戰爭有決定和改變人類生活形態的力量。

二、春秋之世，兵連禍結，戰爭佔著全部歷史，一般的觀念，都認為戰爭是立國拓地之基本手段，是求生存求生活的必要方式。所以對於戰爭的本質觀念，就無加以詳盡探討的必要了。

上面的論述，已證明了孫子的戰爭基本觀念，孫子是肯定戰爭的，但因為黃帝的兵法，至今沒有流傳，無從以實際的材料來加以引證。至于春秋時代的社會狀況，是否確予孫子以思想上的啟發，也因為我們對孫子的身世不甚了解，尤其孫子除這十三篇以外，再沒有其他的著述，可以供我們證實這一推想的不誤。從學術立場來看，我前面的見解，只能說是一種設想，而不是真理，因為缺乏史料的證明。于此我不得不于黃帝之外，再找出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易經的戰術思想。

「易」是變易交易的意思，「經」是伏羲氏所畫的卦，陸德明（唐吳縣人，名元郎，以字行，善明理，歷任陳隋，高祖時為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著有經典釋文，諸經音讀多特以為據。）經典釋文說：「宓犧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觀于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

易經讀本註說：「卦者，掛也，懸掛物以示人，二畫雖象陰陽之氣，求成萬物之象，必三畫以成三才，但初有三畫，雖有象于交通之理，猶未盡，故重之以六畫成卦也。」可見易經原來是一部講求陰陽變易之理的玄書，究竟當時伏羲畫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是否掛象以示人，現在無從研究。周文王拘於羑里，仍作卦辭，以說明每一卦的含義，後來孔子又作序卦傳，說明八卦所列次序的意義。這重排列方法，可以證明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已發達到極點，從「乾」卦起一直到「未濟」卦止，

所講的，完全是社會進化的原理，其間對戰爭的發生，與戰爭的意義，和現代最進步的學說，毫無不同。孔子認為天地生萬物，故乾坤兩卦，為六十四卦之首，萬物的生長，必須經過一番培養，尤以人類為然，人類因為尋求飲食，以圖生存，於是發生了爭端，這是戰爭的起源，也是戰爭的人生意義，更證明了，戰爭是改進人類生活的動力。孫子雖沒有承繼儒家的思想（因為孫子的生年，約略和孔子同時，孔子晚年始好易，其時孫子恐已死去。）但易經中的戰爭本質論，仍給予孫子在思想上一個重要的基礎。

孫子雖認為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動力，但仍以為戰爭的方式，不只武力戰一種，如果能不費一矢，不折一兵，用伐謀來屈服敵人的意志，乃是最好的戰爭方式，萬一計謀失敗，則必訴諸武力，所以他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種思想的發生，我認為是孫子受了黃帝七十戰定天下，以及春秋時不斷發生戰爭的一種反響作用。七十戰而定天下，已足顯示戰爭的慘烈與艱苦，春秋時每次戰役的結果，戰爭者未必能達到預定的目的，勝固有利，敗則亡國覆軍，所以孫子竭力倡導伐謀的戰爭，來替代武力的戰爭，以減少戰爭所及於國家的危險。

我以為孫子這種思想的形成，還有一個現實的原因。那就是針對吳王心理而發的，吳王登臺南向長嘯，可知他復仇的心理是非常迫急。但吳在新敗之餘，國力削弱，是否能實施武力戰，頗成問題。因此，孫子以謀攻的戰法，來激動吳王重用，也未可知，如果這一種推想是正確的話，那末孫子這種超越戰爭思想的構成，也是出於偶然的靈感。不過我以為孫子在兵學上的造詣，非常精深，他對於黃帝時代的戰爭，以及春秋時代戰爭爆發的因素，以及最後成敗的後果，都會加以一番研究，所以歷史因素以及時代環境，還是構成他這種思想的主要動力。

黃帝的思想以及戰果，給予孫子一個重要的影響的，就是速戰速決主義。作戰篇裏對於這一問題，解釋得非常清楚，歷史的事實，使我們認定黃帝，對四方諸侯的七十戰，決不是七十次的戰鬪，而是七十次的用兵，每一次用兵，一定是時間很短，才能取得勝利。春秋時代諸侯的暴師遠征，卻又與黃帝的作戰相反，因此孫子快速論的構成，實有其至深的含義。

孫子在「兵者國之大事，」不可盲動這一基本觀念下，認為遂行戰爭，必須具備幾個戰勝條件，那就是他在始計篇所說的：「道、天、地、將、法。」孫子以「道」列為五事之首，很有研究的價值，而且無疑地他是因為當時社會、政治的混亂，因而應用了老子的學說。

「道」是老子哲學思想的基礎，他認為天地萬物都生於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對於「道」的形容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這個「道」的性質，是無聲，無形，有單獨不變的存在，又周行天地萬物之中，生於天地萬物之先，可見老子所說「道」的作用，並不是有意志的作用，

只是一個「自然」而已。「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老子的這種哲學思想的發生，原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在老子前的三百年（從周宣王二十八年到周敬王二十年）間，可說是一個三百年的長期戰爭。在這三個世紀中，也不知滅了多少國，破了多少家，殺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而社會貧富的不均，政府對民衆則削奪榨取，使社會入於極度不安的狀態。一般的社會思想，有憂時的，有厭世的，有樂天安命的，有縱慾自恣的，有憤世的，老子看見那種時勢，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所以主張一切要反諸自然，因而他的政治思想，也著眼在「無為」而治，以攻擊當時政府的「有為」而治，他說：「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無為」的政治學說，與歐洲十八世紀的放任主義，頗相類似，主張不干涉政策的，從他「治大國若烹小鮮」這一句話中，就可以推想出老子對於政府權能，所下的限制了。但在春秋時代，老子的學說，不過是一種學說而已，並沒有改造當時政治體制的力量，戰爭還是戰爭，社會混亂還是社會混亂，政府與人民之間，只有乖離而沒有協和，所以孫子雖引用老子「道」的學說，但把他折衝起來，成為一種在當時社會環境裏，可以實現的「道」。

孫子對於「道」所下的定義是：「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令民與上同意，就是舉國一致的意思。政府要修明政治，顧慮軍事國計民生，激發國民的愛國心理，提高文化水準等等，都是達到令民與上同意的手段，這樣，在戰爭的時候，才能出死入生，使人民為捍衛國家而犧牲，可見孫子所謂「道」，是返諸實現的自然，一切政府的措施，都能合乎規律，規律是一種自然的法則，也就是「道」，不是像老子那樣，返諸自然，而是合乎自然的法則。

孫子認為達到「道」的方法是「令」，他說：「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這就是說人民的一切，都要受國家的教育管理，以紀律來維持上下的感情，而做到完全服從的地步。所以孫子關於「道」的思想，雖然承繼老子的學說，但經其折衝之後，其表現在政治上的，不是不干涉主義，而是干涉主義，他認為極端的放任，不能奠定立國的基礎，這樣與老子的原意，完全相反。老子是主張絕對的「無為」。孫子主張絕對的「有為」，也合乎自然，也合乎道。這可以說是孫子卓越的創見。孔子所作序卦傳，自「比」卦以至「泰」卦這一段，說的也是「有為」的為政之道，但我仍認為在歷史的紀年上，孫子的「有為」政治思想，還在孔子以前，所以說他是創見，並不是武斷。

道的作用，表現在作戰上的，就是上下協同一致，孫子認為這是戰勝的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是天，天是「陰陽、寒暑、時制」。第三個條件是地，地是「廣狹、死生、遠近、險易」。第四個條件是將，將是「智、信、仁、勇、嚴」。孫子對於將才的要求，非常嚴格，他認為一個將領，必須具備這五種武德，才能深明戰法，變化無窮，而取得勝利。軍形、兵勢、虛實各篇裏所講關於原則的變化運用，

孫子認為全在於為將者的智謀，所以他特別提示為將的重要。第五個條件是法，法是「曲制、官道、主用」。我們如果把上面的五事，加以分析，可知道，天地將法者，實際上就是中國古時的天時、地利、人和的三大戰爭要素。天地是天時地利，道、將、法是人，十三篇的全部意思，都發源於這一點上。

孫子兵法的妙用，就是出奇變化，這種思想的成立，是否祖述黃帝與太公的兵法，我們無法考證，惟發源於易經這一說，是此較可靠的，因為一部易，是講變易的狀態，以為天地萬物的變化，都是起於一個「動」字。何以會有「動」呢？這都因為天地之間，本有兩種原力，一種剛性的叫做「陽」，一種柔性的叫做「陰」，這剛柔是兩種原力，互相推擠，互相調和，於是生出種種運動，種種變化。孔子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易繫辭傳說：「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也是說：「萬物是由極簡易的，而變為極複雜的。」

孫子兵法中最精警的思想，就是奇正的原理，一切變化，都從這裡而發生。這奇正原理和易經上陰陽的原則是一樣杓，孤陽不長，孤陰不生，純陽之道，只是健而無變，健之至則衰，無變則不生，自然的原理，固然如此，用兵的原理，也是如此。孫子的所謂正兵，是剛性的戰法，作戰的時候，敵人如果也用剛性戰法作戰，則兩剛相遇，必兵久而無功，如敵用柔性戰法，則柔能克剛，必至敗軍覆將，奇兵是利，所以孫子認為用兵之道，奇兵與正兵必須配合起來作戰，才能像陰陽的配合而生萬物，這陰陽相合所生的結果，在哲學上，謂之萬物，在兵學上謂之勝利。

奇正的原理，表現在實質現象上，就是虛實的運用，衝虛是奇的手段，備實是正的手段。所謂備實，就是自己先要立於不敗之地，這是正兵相合作戰的原則，自己的地位穩固以後，然後求敵之虛而攻之，這是運用奇兵作戰的原則。說得明顯一點，奇兵是求敗敵，正兵是求不敗，易經說：「坤」有順德，就是「坤」有應順乎「乾」元的作用，這樣陰之能順乎陽之性，而生萬物。用兵也是一樣，奇兵必應順乎正兵的要求，方能發揮奇兵的作用，這就是陰順陽的道理。陰陽相合而生萬物，奇正相合而生的無窮的變化。

易經上對於陰陽這兩大原力的配合作用，沒有明白的敘述，周文王認為陰陽既能生萬物，就可以推知陰陽配合的方式，是千變萬化的，如果僅僅是單獨的一種方式，那末宇宙間，只能有一物，而不能有萬物，孫子所說：「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的道理，也是從這種思想裡面領悟出來的。奇正配合的方式無窮，所以變化才能無窮。

現在有一般人把戰法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剛性戰法，另一類是柔性戰法，速戰速決主義是剛性戰法，持久抵抗是柔性戰法，這種說法，是思想上最大的錯誤，其實所謂剛性戰，是指絕對的進攻或防守主義而說的，柔性戰是指利用時空而定作戰行動而說的。換句話說：剛性戰是打硬仗，柔性戰是不打硬仗。但速戰速決主義與絕對攻擊論，是不同的。速戰速決是戰略的目的，絕對攻擊論只是實現戰略的手段，這個道理是非常明顯的，我們舉一個最好的例子來說明，德國的閃電戰，大家都知

道是速戰速決主義，但在實行戰爭的時候，並沒有打硬仗，恰恰相反的，德國只在有利的時期，有利的地點，一舉而殲滅敵人，這種方法，並不是剛性戰法。所以我要介紹給讀者一個正確的觀念，就是戰略的原理和目的，決沒有剛性與柔性的不同，戰法才有剛柔的區分。

戰法的目的，是在實現戰略的目的，戰法要實現這個目的，因此戰法不能有固定的方式，更不能用純然剛性或柔性的戰法，以配合戰略目的，所謂「盡運用的能事」這句話，就是要求剛性戰法與柔性戰法的配合運用，孫子奇正相生變化原理的精神，即在於此，至其思想的成立，則敢斷言：他是領悟了陰陽相合而生萬物的哲理。

第三 孫子與西洋兵法

孫子十三篇流傳到外國去最早的時候，是在唐代，由吉備真備從中國帶到日本去時計算起來，已有一千二百多年。至於流傳到歐洲去的時候，我們無法考證，據說：法國到東方傳教的教士，曾經把孫子兵法帶回法國去，譯成法文，拿破崙大帝在縱橫歐陸的戰陣中，常手不停披的閱讀孫子。德國皇威廉第二，在他沒落的僑居中，讀著歐譯的孫子，曾經發過浩嘆說：「在二十年前，倘若讀到這書，則……」據說他最受感動的是火攻篇裡的幾句話：「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可見孫子流傳到歐洲，一定是時間很早的，所以才有譯本。

上面所引證，只是很簡單的說明孫子流傳到外國去的史實。

孫子對於日本兵學界的影響，非常之大。日本的古代兵法，如甲陽軍鑑，信玄全集，兵法紀，兵法秘傳等書，其中心思想，都是祖述孫子。此後，註釋孫子的書非常之多，而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一部份日本人，認為孫子的理論，不但是用兵的哲理，而且是一部份最好的人生哲學。自從日本接受了西洋兵學思想以後，對於孫子的解說，又有很大的進步，例如：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日本聯合海軍總司令東鄉元帥，於對馬的大海戰，大敗俄國的海軍，據他自己說，那次的戰勝，其陣法是應用孫子的原則，就是從孫子「以逸待勞，以飽待饑」這兩句話領悟出來的。日本對我的侵略，自外交謀略，以至於作戰，更是隨時隨地，都在應用著孫子的原則。

在西洋兵法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與孫子思想暗合的地方，但他們究竟是否受了孫子思想的暗示，因為沒有可靠的材料，不能貿然予以武斷的肯定。如果西洋兵法的形成，是一種自然的發展，那末我們可以斷戰術思想的成立，中外都出於同一自然律的支配。

從戰術的演變上來研究，原人時代就有戰術，兵學家說：原始人類的狩獵行為，是戰術的雛型。在此我們就發生了一個疑問，即原人時代，人的思想，極不健全，

何以會想出獵獸的方法呢？這個問題的解答，我想這一個根據是出於人類的本能，人在天賦中，已具備了爭的天性，因此，才能發生戰術上的行動。

人類在獵獸中，當最初一次襲擊他的目的物，未必是成功的。其間必有許多人因為求生——獵獸，反而喪失他自己的生命。這種失敗，給予未死的人一個重大的教訓。他們知道，用某一方法去獵獸，既要喪失生命，就不是一種好方法，於是他們繼續研究和試驗用新的方法，直到很安全地獵獲獸類為止，因此，這種新方法，就成為狩獵的原則。等到人與人爭的時候，就是運用人類與獸爭的原則，因為人類最初使用的方法，就是獵獸的原則，這種原則，可以稱之為單純的攻擊原則，但人的智力，高於動物的智力，這種獵獸的原則，也許遭到嚴重的打擊，如是人們知道真面目的攻擊，不是取勝的要訣，就另應用出奇的方法，用出其不意的手段，來襲擊敵人。所以我所定的戰術上的九個大原則——目的、攻擊、集中、機動、安全、奇襲、協同、簡單、迅速的成立，都有其一定的歷史的發展程序。人類獵獸，是在取勝，所以首先就成立了目的這個原則。為達到取勝的目的，又成立了攻擊的原則。真面目的戰鬪，未必能取勝，於是發現了集中力量，攻敵弱點的方法，這是集中原則的成立。乘敵之弱，必須明察戰機，窺破敵情微妙的變化，才能隨時隨地衝敵之虛而擊破敵人，這是機動原則的成立。要確保自己的機動，自己先要有不敗的把握，不被敵人所乘，這是安全原則的成立。自己確保了機動與安全，才能用出奇的方法襲擊敵人，這是奇襲原則的成立。奇襲的原則，是運用奇兵，以助主力的戰鬪，所以協同作戰的要求，較諸密集戰鬪時，更為重要，這是協同原則的成立。由於大兵團的運用，指揮統御上，必須力求簡單，而攻擊重點選定，必須由正面而變為點，這是簡單原則的成立。用兵之道，久則無功，這是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在古代是如此，在現代也是如此，這是迅速原則的成立。這種解釋，也許有牽強的地方，但我們如僅從歷史發展的立場來研究原則的成立，就可以承認我這個觀念，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如果我們從戰術的意義上來分析這九個原則的成立，那末結論必然是不同的。我所以作這樣的論述，就是要證明戰術上各個原則的成立，是在人類全部戰爭中，逐次成立的，逐次累積而來的，不是一次就形成這麼多原則的。

西洋戰術思想的完成，是在克勞塞維慈時代，中國戰術思想的完成，遠在孫子時代，而且到孫子時，已集思想的大成，發展到頂點。東西的戰術思想，相差竟至二千餘年，這原因在甚麼地方呢？我認為：

第一是由於文化的發達：中國文化到春秋戰國時，已有偉大成就，所以戰爭思想，也有同樣的發展。

第二是由於文明主流的內容不同：中國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洋的文明是物質文明，所以中國的戰爭，是以精神來推動戰爭思想的，西洋是以技術來推動戰爭思想的，這是中國軍事技術落後的原因，也是西洋戰術思想發達過遲的原因。

孫子的戰術思想始終站在指導的地位，過去我們沒有把他作現代的研究，以致西洋的戰術思想，反而支配了全世界的戰爭精神，現代我們要努力於孫子思想的闡

揚，同時以現代戰術來作對照的研究，相信在這研究之中，必能發現寶貴的結論。我們過去寫孫子與現在這本書的目的，就在引起大家研究孫子的興趣，也許中國獨立自主的戰術思想，從此可以建立起來。蔣（介石）總統說：「大家要知道，無論什麼時候，一切事物的原理是不變的，原則也始終如一的，好此一二三四五一定總是一二三四五，一加二總是等於三，一加一總是等於二。所以古今中外的戰術戰略，無論化學利器發明怎樣利害，儘管戰爭的情形和所用的武器是怎樣不同，但是戰術戰略的原則，始終不會變更。所以我們中國兩三千年以前的孫子和孫吳兵略問答這些書到現在還是同樣的有價值，並且其意義亦與日俱新。比方孫子說：『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這不是講現代的戰術嗎？有很多就是現在外國人最新最進步的戰術原則。可是我們中國一般沒有智識的人，自己國裏有很寶貴的東西不知到拿來研究運用，以為陳舊落伍，抹煞一切，只知外國的東西什麼都好，想要用，但又學不像用不會，結果使中國軍隊到如今弄得不成一個東西，要知道我們一個人，尤其是一個中國軍人，切不可自暴自棄，捨近圖遠，總要誠心誠意，實是求是，精益求精來努力進取。現在中國軍隊練不好，要給外國人欺侮，不當作我們中國的軍隊是一個軍隊，是甚麼道理？就是因為我們一般軍人有一個最壞的習慣，以為外國甚麼東西都是寶貴，我們中國甚麼東西都是廢物，沒有用的，以致自己固有的甚麼東西都棄之如敝屣。同時，外國的東西，也只學得一點皮毛，大多數軍人都不三不四不文不武，外國人不當我們是一個軍人，而我們現在用的武器和戰術，也是不新不舊，不中不西，說他是完全照中國舊的道理辦嗎？他又不是，說他是完全照外國新的辦法嗎？也不是。鑒於以往的失敗，我們應當覺悟，以後再不要有新舊和中西的成見，只應選擇最適合中國國情和需要的辦法來做。」也是這個道理。